

吴文化知识丛书

吴学研究所编纂

吴地經濟學家

薛葆鼎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吴文化知识丛书

吴地经济学家

薛葆鼎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吴文化知识丛书》(第三辑)

吴地经济学家

薛葆鼎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扬中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00 千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305-03085-6/G·459

序

区域文化研讨热潮的涌动，是近年来中国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向，它跟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密切相关。市场经济的取向，冲破了大一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为地区经济的自立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而调动、开发本地区文化资源，使“文化力”转化为“生产力”，以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便成了当务之急。“区域文化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的强劲的势头和持续推进的前景，由此得到保证，但不可避免地也会染上某种急功近利的色彩，偏重实用而忽视理论总结，甚至带来若干一哄而起、杂凑成篇的不良学风，需加警惕。

地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三吴地区，有着悠久的文明开发历程，经济实力雄厚，人文资源富饶。吴文化研究在我国各区域文化探讨中起步较早，发展迅猛，成果丰硕，并非偶然。在当前形势下，用好这一笔精神财富，推动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和文明建设，自有其重要的社会效益。但据我看来，吴文化研究的意义尚不止于此。我在漫议吴文化历史道路的一篇短文中曾经谈到：上古时期吴地稻作生产的出现和推广，为中国古老而发达的农业文明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宋明清江南经济的繁荣，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和市镇商品交换盛行所形成的农商复合型社会结构，给古代传统的

近代变革率先作了准备；清末民初民族实业集团于吴地崛起，是在原有农商文化之外，开辟了新型的城市工商文明基地；而晚近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苏南模式”闻名全国，则又在城乡工商与农商间搭起桥梁，初步实现了农工商社会文明一体化。四个台阶、四次飞跃，勾画出一条由古老的农业文明向近现代工业文明转换生成的历史轨迹，其清晰的印记和先驱的作用，是其他地区文化所难以比拟的。据此，吴文化研究不纯然是区域性现象，它包含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意蕴。

吴文化与近现代海派文化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姻缘组合。上海本属吴文化区的边缘，开埠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化都市地位的确立，逐渐孕生出各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其影响甚至盖过了吴文化。但两者仍有血肉联系。不仅海派文化内涵的人文气质和商业化导向均渊源于宋明以后的吴文化传统，就是呈现于它身上的古今、中西、雅俗几对矛盾相交织而构成的特异风貌，亦同吴文化近世的演变如出一辙。所以，研究海派文化，少不了吴文化这个参照系。然而两者又有差异。上海由于开埠的作用，在短时间内，由弹丸小县城一跃而为国际性大都会，市民取代乡民，城市压倒农村，由此产生的海派文化，一开始便显现为都市商业性文化，有着浓厚的市民情味和洋化色调。与之不同，吴地社会虽与上海经济腾飞息息相关，毕竟是容括广大农村与众多城镇在内的整个区域，其所经历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只能是渐进的过渡，于是发

展出一种半土半洋、亦今亦古、俗胜于雅的城乡混合型文化，这就是当下的吴文化。从更多地反映现代工业文明业绩而言，海派文化自有其优长，而若更追寻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推移、演化的踪迹，后者也许更具有典型性。它们之间的共生与互补，是文化研究上饶有兴味的课题。

再拓开一层，吴文化的历史观照，甚至可以放置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把握，尤其对于东亚地区。东亚各国在古代都曾立足于稳固的农业文明，进入近代后，也都面临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考验，并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先后走上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过程中，它们大多避免了西方世界以往常用的以农村破产换取工业起飞的办法，也不像拉丁美洲一些地区搞单一的种植园经济，使农业彻底成为市场商业的附庸，相反，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多种经营的农村生产格局大体保存了下来，并逐步朝向新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化的生产规模跃进。事实证明，这样的传统农业在经过适当改造之后，不仅可以适应商品经济的运行，且能给现代化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以有力的支持，显然这较优之于牺牲农业、片面追求工业化的做法。这种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并举而相互促进的方针，必然会给现代文明建设带来强大的后劲。东亚地区近期经济增幅高居世界前列，这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不难看出，吴文化走过的历程，正体现着东亚文明现代化的基本取向，而它在当前形势下所作出和正在作出的种种新创造，

又将大大丰富和加深东亚文明的新经验、新传统。

老友高燮初先生历经风霜，不隳壮志，唯思老有所为，集合桑梓同仁，争得社会各界支持，于无锡堰桥镇办起以民俗文化展示为特色，集思想教育、知识博览、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吴文化公园，深得中外人士交口赞誉。在此基础上，他又创立全国第一所民间科研机构——吴学研究所，发起、组织有关研讨，出版论文集，编纂《吴文化知识丛书》，大力推进吴文化研究。数年坚持不懈，《丛书》已出版第三辑，在保持、发挥前两辑一题一篇、丰富多采、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特长的同时，另增加各类审美化形态的考察，使吴地社会生活与民情风俗的写照更为全面。整套《丛书》五十种问世，不啻是一部吴文化专业的百科全书。这种不辞辛劳、不图近利、扎扎实实从事基本建设的学风，正是眼下区域文化讨论热潮中应加以肯定和发扬的。燮初先生作为弘扬和开发吴文化的功臣，当之无愧，其以创业者身份而热心于传播学术，尤属难能。谬承厚爱，嘱为之序，敢不从命，略陈鄙见如上，以为吴文化研究之鼓吹云尔。

陈伯海

一九九六年十月

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

前 言

吴学研究所所长高燮初教授，1995年5月到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特约讲座，5月10日才讲完，当晚便到我家当面约稿，托我编写介绍《吴地经济学家》的小册子，为吴学研究提供一些人文史料。他热心吴地文化，热情可感。

30年代，以无锡为中心，吴地出生的经济学家确实比较多，在地下革命工作中我遇见的也不少。选些有代表性、有权威性的写传略，可有十五六个人。要勾划清楚他们之中每一个人，多写需一二万字，少写也得三五千字。学术性、理论性集中得太强了，好比浓缩鱼肝油，使人望而生畏；要写得生动、有可读性，也不容易。我不自量力，只好试试。无锡人方言“六十岁学打拳”，意思是学得太晚了，也学不好。那么我是80岁学编写，只好边干边学，一遍一遍多向旁观者请教，尽量多改。我动了手之后，才尝到其中滋味。初稿曾达10多万字，初步定稿时已改成85000字左右，只好就此交卷。

我首先列入传略的是年近百岁、闻名国内外的社会科学家陈翰笙。陈翰笙，二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下组织了多次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与中国的革命任务，结论完全符合于中国

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此调查过程中培养和提高了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随着民族危机日益沉重，他们纷纷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成名的经济学家，有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王寅生、姜君辰、张锡昌、秦柳方等，他们都是无锡人，都同陈翰笙对他们提携带路有直接关系。陈翰笙十几岁就离开故乡，离开祖国；20年代回国后又4次流亡国外；三四十年代一直在国外，晚年才定居北京。因此曾自嘲说：“我已成了无锡话的野猫头。”然而，无锡人是忘不了他这位革命的老前辈的。

我其次列入了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王昆仑。王昆仑是经过大跨度思想转变的。在南京这个白色恐怖的中心，30年代组织了南京读书会。他同大家一起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开始，一章一节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然后宣传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救国会运动，特别在南京和无锡，为突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多年高压空气做出了特殊贡献。南京读书会中同他一起的地下工作者后来专业经济而成名的有孙晓村、钱俊瑞、张锡昌、狄超白、秦柳方等。他自己限于地下工作岗位的条件，没有写作经济专著，但他的许多活动涉及好些经济学家共同的历史背景，他曾为他们多次创造过地下工作条件。写了王昆仑，再写别人也比较顺当。

30年代成名的无锡籍经济学家中，钱俊瑞是领导上海地下党叫做“X团体”的读书会，又成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在救国会运动中战绩辉煌；薛暮桥早期主编《中国农村》，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长期担负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对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都有卓越贡献的；孙冶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强捍卫者而闻名的；王寅生是陈翰笙组织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最早的得力助手，一手创办了财政经济出版社；姜君辰对经济科学的翻译、编辑、出版、研究、教育都有贡献，对合作社、农村商业尤多探究；张锡昌是杰出的救亡工作者和统一战线工作者；秦柳方对农村经济、工业经济、世界经济、理论经济都有精湛研究。

和他们同时成名的经济学家中：余杭的孙晓村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一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社会活动家；溧阳的狄超白，以专著《通俗经济学讲话》蜚声于文化界，50年代创办了《经济研究》杂志，遭遇到多年冤案后也已平反昭雪。

比他们成名略晚的有：苏州的吴大琨，他是专攻世界经济的；南通的许毅，他是专长于财政经济的；江阴的季崇威，他是对经济建设和外贸经济方面有独到成就的。

上海出生和主要在上海与各地活动的经济学

家，此次都未列入传略。

此次已列入传略的 15 人中，学历最高、往来国际活动最广的当然是陈翰笙，他的际遇不可多得，对革命贡献也难以笔墨叙述描绘。更值得注意的：一是才读 3 年初级师范便从铁路上当练习生，再参加革命而在国民党的“监牢大学”里自学成才的薛暮桥；二是早年失学，为纱厂学徒出身，而在革命斗争中成长成熟的许毅；三是初中未读完，当报馆练习生出身，以经济理论作武器为革命与建设战斗不断前进的季崇威。他们 3 人没有什么学历，靠刻苦自学成为名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里也列入了爱国民主人士祝世康，他是主张为孙中山学说建立“民生主义经济学”，而在解放前为统一战线工作出过大力。除了祝世康之外，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编写过程中，年近 90 高龄的经济学家秦柳方，多次冒着酷暑大雨，提供了宝贵素材和重要编辑方针，使本书大为增色，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薛葆鼎

1995 年 10 月 9 日于北京

目 录

陈翰笙	1
王昆仑	19
钱俊瑞	35
孙晓村	47
王寅生	59
薛暮桥	67
祝世康	80
孙冶方	86
姜君辰	101
张锡昌	112
狄超白	123
秦柳方	134
许毅	143
吴大琨	150
季崇威	158

陈 翰 笙

陈翰笙教授，是一位忠于科学、忠于历史、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他学识精湛，对经济、社会等研究领域，都有深入见解，对于当代历史，时有睿智的总结性判断和科学的预见性评述。他早年为革命事业冒险犯难的事迹很多，有些早已饮誉国内外，但是要在短短的一篇传略中充分表达出来是很不容易的。

一、他在封建家庭中，得力于母教

陈翰笙，1897年2月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东河头巷的知识分子家庭。原名陈枢，小名翰生。母亲顾氏虽没有进过学校，可是能勤俭持家，从来不为日子艰难穷困向人求个帮衬。她常说：“人是穷的，心是铜的”，“宁吃开眉粥，不吃愁眉饭”，“为人要正派，勿要长双势利眼，勿要看见大佛得得拜，看见小佛踢一脚”。陈翰笙80多岁时和妹妹两人还整理出一套母亲用无锡方言教导他们要做好人的谚语。

二、良好的中小学教育和受辛亥革命的启蒙

他7岁进无锡东林小学。此校300多年前明代

东林党人遗风尚存。校风名联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直的修身教员贯谈如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教育学生要爱国。

读完小学，考进长沙明德中学。同盟会会员、南社诗人傅熊湘给他们上历史课，大讲：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人民抗英；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气概。他就是这样不断地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

三、留学美国、德国，一再转系转学，转向了学历史

他在长沙雅利学校读高中。1914年，在长沙青年会听到美国化学家罗卜生讲演美国的路斯·卜班克博士用不同的品种嫁接成“金山橙”。金山橙，皮薄、多汁、无核、饱满、多糖分。他恨不得马上学会嫁接良种橙的本领，这样就不用进口美国的金山橙了。他受到了当时“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

1915年，高中毕业，他对父亲说想去美国留学，遭到拒绝。他就搞“饥饿斗争”，绝食近10天，母亲暗暗当卖金银首饰，凑足2000元路费，他才得以横渡太平洋到了美国。

陈翰笙起先进了美国东北部麻省郝门山男生工读学校。他边读书边打工，从拔草、熨衣到餐厅当侍役、端盘子、做计时工，为的是积攒学费。

一年后，考取了美国西南部的波莫纳大学，第二学期就得了奖学金。因视力差，读植物系看不清

显微镜下的小于细胞的物体，读地质系画不好野外的地形图和地质图，他两次转系。那时早期资本主义的学风尚未消逝，教师还很关心学生，在教师提醒帮助下，他从植物系转到地质系再转到历史系。最后著名的历史学家韦斯脱卡特教授看中他的英语才能，安排他转入历史系，同时让他帮助教授批改同学的卷子而结束了他在餐厅托菜盘的工读生活。

读了四年，英文教授推荐他参加一个文学会，他又被该会推荐到校办的《学生周刊》当编辑。

1920年夏，他在波莫纳以获得金钥匙奖毕业，韦斯脱卡特推荐他到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当助教。他在波莫纳已学过法文、德文，但为了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史又专攻俄文。1921年夏，他写的论文《五口通商与茶叶贸易关系》，揭示了茶叶出口靠人夫挑运，从皖南产地到广州港口，沿路带动了食宿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这一经济规律，而得了硕士学位。

1921年冬，陈翰笙与查良钊、段锡明、罗家伦出任“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代表，苦劝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团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不要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九国公约》上签字。1922年2月6日，北洋政府仍然授权顾维钧签了字。《公约》只限制了日本在东北的垄断权与英国在中国本部的独霸权，却为美国打开了中国的通商门户。陈翰笙深刻领悟到了中国被瓜分的国际地

位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真面目，更想找机会去欧洲了解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俄国和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他为此转学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专攻欧洲史。这时，战后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一元美金可换几亿马克。他便携新婚夫人顾淑型同去欧洲，考察了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1922年春，他俩在南欧旅行6个星期走了6个大城市，得以目睹几个战败国的社会经济现状和了解其历史背景。他进了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工读，主要研究苏联，旁及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两年后，他写了《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论文，取得了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他掌握了4种外语，所以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件，给他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

四、回国到北京大学当“娃娃教授”

1924年春，旅游欧洲的蔡元培邀请陈翰笙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当时他才27岁。

蔡元培当时张罗各派学者任教，做到“无所不容”。从进步学者到保守学者，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君默、林语堂、朱家骅、王世杰、李石曾、梁漱溟、辜鸿铭。校内各派学术思想十分活跃。陈翰笙任历史系和法学系跨系教授，受到喜欢读书做学问的学生普遍欢迎。

五、走上革命的道路

陈翰笙常同在芝加哥大学“新中学会”内结识的进步教授高仁山交谈对时局动荡的忧虑。高仁山约陈翰笙同访李大钊，李大钊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公开的，可是对他们两人一见面就要求入党只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许多共产党人也都在国民党里工作，你们先加入国民党吧！”于是介绍他们两人参加了国民党。往后，在实际行动中，陈翰笙很快就同李大钊越来越接近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李大钊领导北京群众3000多人为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勾结帝国主义的卖国行为而示威游行，在铁狮子胡同遭到段政府卫队开枪袭击，死伤300多人。枪响时，陈翰笙、顾淑型在现场所幸没有受伤，亲见李大钊在群众掩护下走脱。次日，段政府发出对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住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陈翰笙立即发表了《三·一八惨案目击记》抨击北洋军阀，经常去苏联大使馆探望李大钊。就在使馆里，李大钊介绍陈翰笙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又结识了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和俄专教师格里涅维奇，同他们用英文和俄文畅谈。

陈翰笙从格里涅维奇处借到了德文版《资本论》，他如饥似渴地认真研读。读《资本论》，使他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